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 民族志丛书  
何明◎主编

# 玉狮场的故事

——1949~2009：地方国家的过程与选择

朱凌飞◎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  
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项目

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  
少数民族农耕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研究”（编  
号：04XMZ004）阶段性成果

---

# 玉狮场 的故事

——1949~2009：地方国家的过程与选择

朱凌飞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狮场的故事:1949~2009:地方国家的过程与选择 / 朱凌飞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222-06883-4

I. ①玉… II. ①朱… III. ①乡村—普米族—民族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1949~2009 IV. ①K28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9026号

责任编辑:朱海涛

装帧设计:马 滨

责任印制:洪中丽

《玉狮场的故事:1949~2009:地方国家的过程与选择》

朱凌飞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pre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883-4

定 价 36.00元

# 继承“魁阁”传统 推动民族志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民族志丛书》总序

何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民族志”（ethnography）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写作的文本；其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sup>①</sup>。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而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的产物。

民族志是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术生产的核心产品。在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领域，民族志被视为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的分野，前者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或“书斋里的人类学”：学者们不从事系统的田野工作，其学术成果也不是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表达，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资料来源大都是旅行家、传教士、殖民者、船员等曾目睹过异文化的人士所撰写的文字资料和历史档案文献，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不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不撰写系统的民族志。从19世纪末起，文化人类学开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其标志便是英国动物

---

<sup>①</sup>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19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学家兼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1898—1899年两次率领剑桥大学的考察队赴托雷斯海峡进行田野调查并完成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和英国功能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马林诺斯基（B.K.Malinowski）通过1914—1918年之间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所撰写的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此后，民族志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必不可少的核心性工作，并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学术范式。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它将先前主要由业余学者或其他人员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的资料搜集活动以及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实践”<sup>①</sup>。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通常被视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方法特质，尽管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经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发明并规范之后被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众多学科所援用，但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当作不可或缺的学术实践，也未能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建构了如此系统的田野工作范式和完成了如此之多的民族志经典文本。

民族志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关键。社会文化的描述与理论解释是民族志缺一不可的要素。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自己对花篮瑶和江村的两次调查时深刻地指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我虽然在这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成在一个

---

① [美] 乔治·E.马尔库斯、米卡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第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sup>①</sup>只有抽象理论论证而没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资料的学术文本，是“演绎理性”的理论论著，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令人信服的有价值的民族志；只有社会文化资料的排列堆砌而无周密系统的思想观点或理论解释的文本，只能视为“调查资料”，最多称之为“田野报告”，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具有学术创新意义上的民族志。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互动理论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每一次学术流派的更迭创新，都是围绕着民族志展开的。没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翅》等民族志，就没有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云南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曾经是中国组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学术实践的重要机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吴文藻先生在40年代初与燕京大学合作创办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研究室（因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到昆明近郊呈贡县魁星阁而被称为“魁阁”）。“魁阁”组织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撰写工作，完成了《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著）、《祖荫下》（许烺光著）、《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著）等一批中国早期民族志研究的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鼎盛时期。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迄今未能撰写出“魁阁”时代那样得到学界认同和广泛影响的民族志作品，这既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滞后的表征，也是学界对民族志研究重视程度不足的结果。有感于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于2008年4月恢复与重建“魁阁”研究室，旨在弘扬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家、民

<sup>①</sup>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族学家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实地研究传统，以民族志的学术生产为龙头，全面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创新和学科建设。在“西南边疆研究书系”专门设置“民族志丛书”，遴选出一部分选题具有较高价值、田野调查深入细致、理论阐述较为完整、撰写较为规范的部分成果纳入其中出版，便是这一学科建设理念的具体行动。

当然，学术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优秀的民族志也不可能呼之即来。纳入“民族志丛书”的作品，是有志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努力的结果，能否被学界和社会认可，既需要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时间的检验。

我们对于“魁阁”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前言：史与志——地方国家的过程研究 / 001

一、“非历史主义”的人类学 / 002

二、“微观历史”与“特殊历史” / 004

三、个人生活史与民族志 / 009

四、“地方国家”的整体观 / 016

第一章 民间记忆与历史建构：60年之前 / 023

第一节 民族迁徙之路 / 027

第二节 历史沿革 / 042

第三节 早期的生活 / 047

第二章 地方国家的发端：大集体时期 / 061

第一节 过渡阶段与土改 / 064

第二节 “大跃进” / 072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 104

第三章 社会的重建：改革开放之后 / 115

第一节 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复苏 / 118

第二节 生活的多样化与文化的回归 / 136

第三节 外部力量的介入与乡村的调适 / 163

第四章 社会过程与网络：个人的选择 / 191

第一节 生于60年前的一代 / 194

第二节 生于大集体时期的一代 / 217

第三节 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代 / 237

第五章 乡村的命运：道路与方向 / 259

第一节 村社的裂变与统合 / 260

第二节 文化认同与主体间性 / 272

第三节 利益主体与话语权之争 / 283

附录 普米族经典《指路经》 / 301

普米族丧俗给羊子祭词《指路经》 / 301

参考文献 / 335

后记 生活与文本 / 343

# 前 言

---

## 史与志——地方国家的过程研究

1949年至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恰为一个“甲子”，对于以天干地支为基本时间结构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时段。宏观上，中国从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成长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微观上，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虽然这种变化远没有结束，我们仍在经历这个社会巨大而深刻的“转型期”，但也到了一个回顾和总结的时刻。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建国60年以来急剧而深刻的变迁看作一个历时的社会过程，它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循环往复形态及社会的历史变迁，包括竞争、突变、改化、冲突、顺应、控制、分化、同化等方式，可分为历史的过程与社会的互动两类。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玉狮场村是一个典型的普米族村寨，据考证，普米族在此定居已逾500年，现已繁衍为一个360多人的村庄。历经建国60年的巨大变

迁，玉狮场村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相对完好的普米族传统文化，但其变迁仍然不可避免地持续着，并在全国性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加速的现象。本书对玉狮场村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企望通过一个微观的视角窥见少数民族地区在这6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种历时性的民族志研究进行了思考：对某一特定社区几十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从哪些角度入手、其意义何在？

## 一、“非历史主义”的人类学

在人类学、民族学对某一文化体系或者特定区域所做的综合性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采用民族志的方法，但其局限在于田野工作中以参与观察、主位—客位研究、文化解释等手段所进行的研究，多限于文化的现时、现场、现状，对于另一历史时空中的文化现象，我们无法在田野中进行“参与观察”，这似乎就不再属于人类学的范畴，而被归入历史学领域。现代人类学借“田野工作”以登上历史舞台，人类学家们“当时的研究焦点是‘现在’，人们没有多少兴趣深入探索所研究民族的历史。……泛泛而论，可以说此前几十年之中，人类学受到超乎寻常的非历史主义的统治，大体上这可以归因于两种居高临下的范式的左右：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sup>①</sup>即使列维—斯特劳斯在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神话时，也不能告诉我们这些神话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之下产生的。所以王铭铭认为：“人类学的非历史以至反

① [澳] 迈克尔·罗伯茨著，王琼译：《历史》，《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3期，第91、93页。

历史，是西方人类学的一种‘精神污染’……这种‘非历史’的民族志，在诠释中国社会时，出现种种问题。”<sup>①</sup>受西方人类学传统教育的费孝通先生的传世之作《江村经济》最受诟病之处，也正是其难以避免的“非历史”的做法。

当然，人类学家们不会满足于“现状”这样一种文化的“切片”，他们也对“纵向”的文化变迁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为首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提出，为理解或解释某一特定的文化，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重建该文化走过的独特道路，即“构拟”该文化的历史。他们认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在研究中强调对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重点研究特定民族的文化历史、事件特点和规律，提倡“历史的方法”。话虽如此，但我们发现，博厄斯在其具体研究中过分强调资料的翔实和具体而微，埋首于微观的钻研，认为历史只能是对各个事实和现象作经验的描述，不应有任何抽象的推理，由于忽视理论概括而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并未能够为我们“构拟”起该文化的历史面貌。

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举起了“长时段”和“总体史”的旗帜，主张历史是一组体系或结构的复合体，各体系或结构有其自身的内聚力。年鉴学派强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重社会结构、系列及多元的理论解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角度和层次。历史必须从结构和体系上加以阐述，史学家不仅要致力于确定这些体系，而且要系统地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倡导的新史学，就是结构的和势态的历史。其目标又在于揭示社会结构，乃至自然界的、物质的和精

<sup>①</sup> 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神的长期结构。<sup>①</sup>年鉴学派强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重社会结构、系列及多元的理论解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角度和层次。然而，年鉴学派过分强调结构和势态中物质环境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历史事件和人的能动功用，其理论模式在实践中也遇到许多障碍而难以操作和全面推行。

萨林斯也曾试图发展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在人类学和历史之间搭上一道桥梁。他致力“恢复事件、行动、变化和世界以期作结构分析。他反其道而行之，寻求为历史而恢复结构分析”。<sup>②</sup>萨林斯据此发展了进化论，提出所谓“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企图建构人类文明宏观发展的基本序列，将人类学研究引向其初衷，即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基本规律。埃文斯·普理查德也一再强调人类学与历史学一样，是一种解释，人类学如果没有时间观念，只有孤零零的结构观念，那便不能理解“土著人”的思想。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人类学在共时性研究之后逐渐开始重视历时性的线索。但遗憾的是，人类学的历史观更多地还是关注经验性研究、关心“变迁”（或“进化”），而不关心“主观历史”，其书写的历史还是经验事实的时间流变，是变化的过程，没有涉及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更为重要的“社会记忆”。

## 二、“微观历史”与“特殊历史”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其传统研究多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

---

① 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② [澳]迈克尔·罗伯茨著，王琼译：《历史》，《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3期，第89页。

细节，重视对总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但出于“理论深度”之虞，却甚少通过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忽视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sup>①</sup>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姆森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中的重大时刻和主观行为者给予了着重关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这个方面的兴趣在英国促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史，为之努力的人士称之为“人民的历史”或“从下面写起的历史”，它以下层阶级、尤其是被社会所忽视的人们为重点，他们的著作寻求真正的现实，覆盖面限于当地，被称为“微观历史”。相对而言，微观历史从较小的方面去考察历史的局部与细节，旨在发现、补充或纠正有关历史事实的记载。如果说世界历史、国家历史等为宏观历史，显然村社历史或个人生活史就属于微观历史之列了，其空间范围较小，时间范畴较短，难以对宏观历史的总体走向产生影响。

在时间范畴上，这所谓“几十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的著名论文，指出以不同的时间概念来量度有三种不同的历史，即以事件和人物为轴心的“短时段”，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数十年为研究单位的“中时段”和以数个世纪为单位的“长时段”。<sup>②</sup>由此看来，我们对某一社区数十年变迁所做的研究，当属“中时段”的范畴了。笔者尝试将三个“时段”有机结合，把该区域“短时段”的偶然事件视为“长时段”、“中时段”的发展结果和集中表现，通过大量的、不同的“短

① 彭小瑜：《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时段”来解读“长时段”中的“中时段”特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时间范畴上我们不能确定一个明确的界线，特定文化自有其生活的节奏和规律，因事件的进程或因果关系，时间具有了社会意义上的持续性和延展性。克洛德·拉尔认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中国的历史观具有以下特点，即宽广的历史全景、汉族的中心地位、内观法（中国本身即世界的中心）、突出的乡土性、以“德”为标志的民主精神、一种公社制的生活模式（以氏族和扩大家庭为例示）。<sup>①</sup>除了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时间外，中国人对时间的概念包含有更多的社会文化因素，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考量的。基于此，我们对玉狮场60年变迁的研究，基本时段划定为1949~2009这一个“甲子”，但不可避免地回溯到1949年之前的历史记忆中，并顺势将目光投向2009年之后的可能发生的变迁。

在空间范畴上，所谓“某一区域”可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上来划分，可以是因地理条件限制而自成一体区域，也可以是依行政区划或文化特征而独显的范围，相对较小。确定了界线，因而也就有了区域“内”与“外”之别。博厄斯指出：“每个文化（即族体）集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因此，博厄斯认为，“研究”各个社会的“动态变化”是正确的方法，其所致力建构的“特殊历史”，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一种“区域社会生活史”。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宏岐认为，区域社会生活史研究对象是区域社会中人们

<sup>①</sup> [法]克洛德·拉尔：《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载于路易·加迪等著，郑乐平、胡建平译，顾晓鸣校：《文化与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社会生活的历史，亦即区域城乡居民日常社会生活的变迁，研究内容似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 区域生活环境研究；2. 区域生活方式研究；3. 区域生活观念研究；4. 区域消费结构研究；5. 社会生活的区域比较研究；6. 区域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sup>①</sup>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志强等也认为，我们可以“从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的表现和演变中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历史演变”<sup>②</sup>。其研究内容就包括了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并且是置于一种变迁的、比较的语境中进行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区域一旦被界定就形成了内外之分，既需要做横向比较的研究，也需要做关联互动的分析。

如此，对某一社区的研究，不能拘泥于一个田野点，“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为我们提供了拓展田野点的方法。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认为民族志要追寻文化的形成（cultural formation），进入多点田野扩散的时一空体系中，去检验文化意义、文化事项以及文化认同的方式。为此他还提出了在不同的场景中转换以建构多点田野的方法，主要从以下六个模式进行：一是跟随人物（people），二是跟随事项（thing），三是跟随人生传记（life biography），四是跟随隐喻（metaphor），五是跟随情节或故事（plot or story），六是跟随冲突（conflict）<sup>③</sup>。跟随人物而转换调查点是最明显也最

① 吴宏岐：《区域社会生活史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周积明、宋德全：《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③ Marcus, George 1998.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In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pp79~105.